

古籍整理概论

曹林娣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古籍整理概论

曹林娣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籍整理概论/曹林娣编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7-301-06898-4

I. 古… II. 曹… III. 古籍整理 - 中国 - 高等学校 - 教材 IV. 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3833 号

书 名: 古籍整理概论

著作责任者: 曹林娣 编著

责任编辑: 张弘泓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06898-4/G·098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3334

印 刷 者: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mm×980mm 16 开本 18.25 印张 368 千字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古籍整理的意义	(3)
第一节 古籍范围的界定和古籍形态的变化	(3)
第二节 古籍的损毁残缺及其内容的真伪杂糅	(14)
第三节 古籍整理的意义及基本手段	(25)
第二章 先儒古籍整理得失论(上)	(29)
第一节 先秦汉唐时期的古籍整理	(29)
第二节 宋元明时期的古籍整理	(47)
第三章 先儒古籍整理得失论(下)	(54)
第一节 辽金元明时期的古籍整理	(54)
第二节 清代的古籍整理	(57)
第三节 传统方法的历史反思和新方法的探索	(71)
第四章 目录版本与古籍整理	(76)
第一节 目录与古籍整理	(76)
第二节 版本的渊源递嬗	(78)
第五章 版本的选择与鉴别	(107)
第一节 版本的选择	(107)
第二节 版本的鉴别	(109)
第六章 出土资料在古籍整理中的运用	(141)
第一节 历史上的出土资料	(141)
第二节 出土资料对古籍整理的作用	(142)
第七章 古籍的标点	(147)
第一节 点校底本的选择和副本的搜集	(147)
第二节 标点古书的态度和目的	(153)
第三节 标点古书常见的错误	(156)
第八章 古籍的校勘	(164)
第一节 校勘在古籍整理中的作用	(164)

第二节	校勘知识·····	(171)
第三节	校勘书籍的基本方法·····	(175)
第四节	校勘成果的处理及其发表形式·····	(183)
第九章	古籍的注释 ·····	(188)
第一节	古籍的注释体例·····	(189)
第二节	古籍注释的基本原则·····	(195)
第三节	古籍注释的主要内容·····	(202)
第十章	总集、别集的编纂 ·····	(211)
第一节	总集的编纂程式·····	(211)
第二节	总集的编排方法·····	(216)
第三节	别集的类型及编纂方法·····	(218)
第十一章	辑佚 ·····	(222)
第一节	辑佚常用的方法·····	(222)
第二节	辑佚的基本要求·····	(226)
第十二章	古籍的辨伪 ·····	(229)
第一节	古籍辨伪的态度·····	(230)
第二节	古籍辨伪常法·····	(231)
第三节	伪书的利用价值·····	(242)
第十三章	古籍内容的考证 ·····	(247)
第一节	必须考证的史料·····	(248)
第二节	参验事实以甄别真伪·····	(250)
第三节	知人衡文和署名的考证·····	(251)
第十四章	序跋、附录 ·····	(256)
第一节	序跋的意义、目的·····	(256)
第二节	序跋的内容·····	(258)
第三节	附录·····	(262)
	练习题 ·····	(267)
	主要参考文献 ·····	(270)
	附录一 甲骨文研究著作目录 ·····	(271)
	附录二 出土简帛书籍分类述略(六艺篇) ·····	骈宇騫(272)
	后记 ·····	(286)

插图目录

- 图 1-1 甲骨“册”/4
图 1-2 甲骨、金文篆文“典”字/4
图 1-3 大孟鼎铭文/6
图 1-4 汉居延木简之一/8
图 1-5 汉居延木简之二/9
图 1-6 石鼓文/10
图 1-7 秦峰山刻石文/10
图 1-8 汉熹平石经残石/11
图 1-9 唐开成石经/12
图 1-10 斯坦因收集的写经本(佛说甚捺大回向经)/13
- 图 2-1 开成石经中的《尔雅》/37
图 2-2 宋刊《说文解字》/38
图 2-3 《五经文字》(右)与《干禄字书》(左)/45
- 图 3-1 《龙龕手鏡》/55
图 3-2 《铁云藏龟》/67
- 图 4-1 清康熙四十六年内府刊本《佩文斋咏物诗选》/80
图 4-2 宋淳熙四年抚州公使库刊绍熙至淳祐间递次修补本《礼记》郑注/81
图 4-3 南宋鄂州覆北宋刊龙爪本《资治通鉴》/83
图 4-4 明屠龙《园居杂咏》稿本/84
图 4-5 元至正年间《此山先生诗集》孤本/87
图 4-6 明万历二年益藩木活字印本万历《大藏经》之《辨惑续编》/88
图 4-7 梵荚装/89
图 4-8 蝴蝶装/89
图 4-9 《蟠室老人文集》/90

- 图 4-10 包背装/90
- 图 4-11 旋风装/91
- 图 4-12 线装/91
- 图 4-13 凿刻“奋武将军印”/91
- 图 4-14 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95
- 图 4-15 南宋嘉定六年刊印《注东坡先生诗卷》/98
- 图 4-16 辽《大方广佛华严经》/99
- 图 4-17 元刻《庐山莲宗宝鉴》/101
- 图 4-18 明南监《金史》/102
- 图 4-19 汲古阁刻本北宋本校刊《说文解字》/103
- 图 4-20 写刻本《渔洋山人精华录》/105
- 图 4-21 民国石印本《营造法式》/106
-
- 图 5-1 书页图/111
- 图 5-2 鱼尾图/111
- 图 5-3 日新堂《伯生诗续编》牌记/112
- 图 5-4 北魏体碑/115
- 图 5-5 南北朝《十地论》写本/117
- 图 5-6 金刊《地理新书》/120
- 图 5-7 《抱朴子》牌记/122
- 图 5-8 宋刊朱熹《诗集传》/124
- 图 5-9 藏书铭语“岂为功名始读书”/127
- 图 5-10 郑樵《通志·六书略》引则天新字 18 个/134
- 图 5-11 武后时《大般若波罗蜜多经》/135
-
- 图 7-1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宋本《李太白文集》/152
- 图 7-2 《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上/153
- 图 7-3 《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下/153
-
- 图 8-1 金文“七”/172

引 言

中华民族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中唯一没有产生文化断层的民族,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仅保留下来的文献典籍就有几万种。1959年《中国丛书综录》收集了38891种;乾隆编《四库全书》,实际收录3461种书,^①存目6793种,合计1万多种书目。孙殿起作《贩书偶记》中有1万多种,相当多一部分是《四库全书》未载的书目;清《方志综录》7400余种。其他如道藏、佛藏、唱词等1万余种。到目前为止,我国古籍的数量究竟多少,还不是十分清楚,有说10万多种,有说8万余种。^②总之,如英国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中所说:“中国所能提供的古代原始资料比任何其他东方国家,也确实比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要丰富……中国则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有编纂历史传统的国家之一。”^③

接下来李约瑟博士又引述高本汉先生说:“对中国人说来,则是数千年的文学作品都能欣赏;他们对本国古代文化的无比热爱和理解,大都是由于文言文的这种特殊的性质之故。”这种古老的文字,尽管字义不明确,却有一种精炼简洁和玉琢般的特质,给人的印象是朴素而优雅,简练而有力,超过人类创造出来的表达思想感情的任何其他工具。^④

黑格尔《历史哲学》中也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

这是一笔巨大而珍贵的精神财富。我国有专门研究古籍书目的学科,叫版本学和目录学。这些古籍,整理出来的仅为一小部分,大部分没有经过整理。所以,整理古籍,是造福中华文化,造福学术界、读书界和子孙后代的重要工作。

古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时代曾经到达的智慧高度,它延续了数千年生生不息的华夏文化,保存着我们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是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的见证。

古籍整理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是“存亡继绝”的工作,它不仅向人们展示历

① 原记录为3503,1959年清理时发现为3461种。

② 王述人:《我国古书之最》,《书林》1980年1—3期;知非:《我国有多少种古书》,人民日报1961年12月13日;《古书数量》,《羊城晚报》1962年12月27日。

③ 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74页。

④ 同上书,第一卷第39页。

史,更重要的是要保留历史,让人们在纷繁芜杂的现实中仍能把握住民族发展的脉络,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参与世界文化交流。

要使中国屹然挺立在上,为全人类多做贡献,根本一点是提高我们全民族的素质。素质的内涵很广,有体力、智力方面的,有文化、科技、管理、政治、思想和理论方面的。一个没有教养的民族,不会有光明的前途,所以,历史文化传统的教育是重要内容。

“以古为镜”,注重从历史中学习,古为今用、鉴往开来,也是我们民族的好传统: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历史上英明的开国之君往往都是尊重历史、重视历史经验的博古通今之士。当然也难免传承因循若干传统文化中负面的东西。

但是由于时代久远,我国古籍留存至今的已经十不存一了,就是这些古籍,也大多很难为今人读懂。我们今天进行古代文化诸如哲学、文学、语言诸方面的研究,必须直接接触这些古书,因之就会产生许多问题,诸如文本内容的舛误、作者真伪莫辨、文字解释古今义的混淆、目录版本知识和文化知识的匮乏等。

所以研读古书,要下功夫,这一点,清代朴学大师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一文中,谈了自己治学的甘苦和体会。他讲到研读古代文献必须具备的全面知识,包括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典制、天文、地理、演算法、乐律以及思想义理的剖析等等。与语言、文学、史学、哲学、文化和思想都有关联,必须从横向联系上加以研究,并注意吸收有关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我们不无启迪。

古籍整理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和技能,在点校二十四史时,白寿彝先生曾说:“通家校书,自古如此。”“通家”,即指具备全面的古典文化知识的人,这样才能胜任校理某一方面古籍的工作。如目录学,主要了解古籍源流;版本学,如何鉴别古籍版本?每种古籍有过哪些版本?其渊源递嬗关系如何?文献学,除了古籍,还包括用文字写出来的,如甲骨、金文、碑刻、档案、户籍、契约、信札等,涉及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中国古典文学、中国通史、断代史、文化史、哲学史、宗教史和考古学等等。以上学问,不是一门课所能承担的。

本课程主要讲授古代文献典籍的形式内容和整理古籍的各个环节,如校勘、标点、注释、辨伪、辑佚、编纂等及其相关知识,如古代语言文字、古籍目录版本、古代历史文化等,还有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这是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对于研究者来说,它关系到对史料的驾驭、精通和考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又属于基础学科的性质。戴震认为,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存于识,重在治论;辞章存乎才,靠创作;征实存乎学,用考证、辨伪,属于朴学。我们这门课即侧重于朴学。

第一章 古籍整理的意义

第一节 古籍范围的界定和古籍形态的变化

一 什么是古籍？

古籍是古书的雅称。哪些书籍在古籍范围内呢？春秋末战国时编定撰写的经、传、说、记，诸子百家是古籍的上限，下限则一般划到清末，即1911年。而所谓近代书籍，习惯上是指鸦片战争（1840）到五四运动（1919）前夕出版的书籍。“古籍”和“近代书籍”在时间上有六七十年的交叉段。这样的划分也不可以机械地理解。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内容或形式上沿袭前此的古籍，也叫古籍，如《孙中山全集》、《南社诗集》、《章太炎全集》、《梁启超全集》等。只有采用新体裁对古籍所作的研究或注释，才不叫古籍，只称作对古籍的整理研究。

我国古籍数量最大的是用汉文撰写的，还有用满、蒙、藏、彝等兄弟民族文字撰写的，在方法上与整理汉文不尽相同，本书讲的仅是汉籍古籍的整理。

二 雕版印刷之前的古籍形态变化

“版本”一词，是宋代才出现的，它是雕版印刷术的产物，事实上，按照刘国钧关于“图书”的界义看，“图书是以传播知识为目的而用文字或图画记录于一定形式的材料上的著作物”。根据这一界义，我国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古籍的流传就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我国书籍形态大体经历了如下的变化：

殷周时代——甲骨、金文、^①竹简；

战国时期到汉末——简册；

战国到唐末——卷轴；

五代到清——刻本、刊本（槧本）；

1840年以后——活字本等；

^① 甲骨文、金文、刻石文与帛书等虽非正式书籍，但从校勘等价值来看，也有重要的“版本”意义，故称。

当今电脑排版时代——电子版。

大体说来,竹帛并行时期,为简册制;汉代发明了造纸术,开始了纸写本时代,为卷轴制;唐代发明印刷术,出现印本,进入册页制时代。

我国雕版印本前的版本,均采用书写或镌刻的方式。因所用材料不同,出现了不同的几种版本形式,主要有龟册、金文、简牍、缣帛和石版。

[1] 龟册书

龟册书是我国最古的书,也称甲骨书,指刻在龟和牛肩胛骨上的书,通行于殷商。当时人们崇尚鬼神,遇事占卜。他们把卜辞刻在龟甲和兽骨的平坦面上,涂上红色标示吉利,黑色标示凶险。这些文字都是用刀刻上去的,大字约一寸见方,小字如谷粒,或繁或简,非常精致。“典”和“册”俱见甲骨文,《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这已经由出土的甲骨文字证实。甲骨文中“典、册”这两字的象形文字反映了甲骨书的装帧形态,甲骨“册”字(图 1-1),像绳子贯若干龟甲或竹木片为一册之形。甲骨文、金文和篆书的“典”字(图 1-2),像双手捧册之形,有典藏保管之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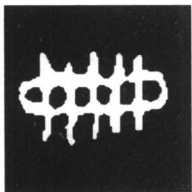


图 1-1 甲骨“册”

甲骨文发现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1928 年到 1937 年间,又



图 1-2 甲骨、金文篆文“典”字

出土了 25000 片甲骨;1975 年出土了 7000 多片,其中有卜辞的就有 5000 多片。据统计,出土甲骨约有 16 万枚左右,出版或影印本已经多达 100 余种。

殷墟出土的甲骨,有贯穿的,有套札的,有叠放的,其中有三片、四片、五片的,都长短不齐,与“典”、“册”所象之形合。这种样式,为后世竹、木书编联之滥觞。此外有“尔册”、“祝册”、“工典”等文。据此推想,殷代可能已经有长文典册,可称为我国最早的原始书籍。龟册装帧形式为后世竹木书编联之滥觞。

从文字结构的发展方向看,甲骨文已超过象形描绘的表现阶段,正值合类比拟的会意阶段,而刚跨入附加音符的形声阶段。^①

据专家们考证,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已有单字近 5000 个,昭示了当时文化的繁荣。

[2] 金文

甲骨文之后是仅有 300 余年生存史的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钟鼎文就是指铸或刻在钟、铎、鼎、敦、尊等铜器上的铭文。因为古代称铜为吉金,所以,钟鼎文亦称金文。内容多宣扬周王的功德,纪念祖先业绩或记载重要事件,这种铭文也可以说是最早书籍形式之一。

^① 尹韵公著:《古代中国社会的传播现象——先秦至唐宋》,载《走向未来》第三卷,第 2 期。

现存商代铜器上的铭文较简单,西周铜器上的铭文就较多。陕西岐山出土的匜铭文 157 字,是诉讼判词;陕西扶风出土的史墙盘上的铭文 284 字,是叙述西周文、武、成、康、昭、穆诸天子业绩的颂词;最长的是西周宣王时的毛公鼎上的铭文长达 497 字。

金文单字比甲骨文时期的单字要丰富得多。例如,甲骨时期,宀部的字只有家、宅、室、宣、向、安、宝、宿、寝、客、寓、宗等 12 字,金文却有家、宅、室、宣、向、宏、康、定、安、宴、窺、富、实、宝、官、宰、守、宠、宥、宜、宵、宿、寡、客、寓、宕、充、宋、宗等 36 字。^①

金文继承了甲骨文文字结构的表现手法,但只侧重形声一途,因而金文中形声字大大超过甲骨文。至于联字成句,联句成章,积章成篇,更是甲骨文所望尘莫及的。^②

甲骨文、金文可识别的字中,人名、地名、官职名占了半数以上,属于常用字范畴的大约有 1000 字左右。

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圆肥秀美,与甲骨文相比,脱去板滞之态,变得更加丰富多姿。《毛公鼎》上的铭文共 32 行,字体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弛不急,行止得当,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大盂鼎》铭(图 1-3)、《散氏盘》铭都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迄今最大最丰富的金文集是《殷周金文集成》。只依靠古籍难以解决的校勘问题,可以凭甲骨文、金文来解决。宋赵明诚说:“史牒出入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辞当时所立,可信无疑。”^③当代于省吾为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作序时也指出:“余谓研讨秦汉以前语文、经学、诸子学、史地学,均须以古文字为发轫,若但以载籍为凭依,则疑讹互生,必不能穷极本源。”

姜亮夫《古文字学》第三章第一节中说:“总的来说,甲骨金文时代的文字结构,主要的是以象形为主,由象形而象意,过渡到表意字。”

[3] 简牍书

刘国钧说:“我国最早的正式的书籍是用竹片或木板做的。所谓正式的书籍,就是指用文字写在或印在具有一定形态的专用材料上以借(供)人阅读为目的的著作物。甲骨、青铜都不是专门作为书写用的材料。专门作为书写用的材料在我国最早的是经过整治的竹片和木板。用竹做的叫做‘简策’,用木做的叫做‘版牍’。因此,这种制度就叫做‘简策制度’或‘简牍制度’。”^④ 简牍书为最早的正式书籍形式之一。简,是古代的竹制书写材料,指一片竹而言,也叫汗简、杀青。汗者,去其竹汁。杀青

① 容庚著:《金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② 尹韵公著:《古代中国社会的传播现象——先秦至唐宋》,载《走向未来》第三卷,第2期。

③ 宋赵明诚著:《金石录·序》,雅雨堂丛书本。

④ 刘国钧著:《中国书史简编》第二章第二节,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



图 1-3 大孟鼎铭文

者，去其青皮。汉刘向《别录》：“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书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汗也。”而其用有二：一为刀刻。《说文解字》云：“八体之刻符是也。”（一曰，简牍文字用刀刻不确。）一为漆书。用漆在竹简上书写，《后汉书·杜林传》云，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漆写的燥湿不易调节，后改为石墨。如有误，则用刀削去。

《晋书·束皙传》载，太康二年，汲郡人发冢，得竹书数十车，皆简编，蝌蚪文字，杂写经史。又曰，时人于嵩山下得竹简一枚，上两行蝌蚪书是也。大抵秦汉公牍文，多是刀刻，故《史记》称萧何为刀笔吏，漆书多中秘书，故汉时经师，有贖兰台令史改漆书经文之事。刀刻不能改，漆书则易改。周秦以前，竹书之用甚广。《说文》篆籀籍等字皆从竹。《汉志》称书曰多少篇，篇亦从竹。《说文》：“篇，书也。”

简册是指编联众简以为册的竹制书籍（亦有削木为简）。简册在先秦居主要地位，且专供人阅读。《左传》文公十八年引用《虞书》、僖公二十七年引《夏书》，隐公六年引《商书》，僖公五年引《周书》，《国语·晋语》说，春秋中叶还“有夏、商之嗣典”，以上资料说明虞、夏、商、周都有典册。周代以后，典册日富：《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周之典籍”，昭公十五年“晋之典籍”，昭公二年“鲁之春秋”，《国语·楚语》上申叔时对楚庄王，提出太子应当学习的书有《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

简册书籍的形制。每册正文之前，加上两支不写字的竹片谓之赘简，以保护正文不受磨损，是书籍扉页的滥觞。赘简之前有“标简”，上写篇名，下写书名。

我们都知道，孔子“晚喜《易》，韦编三绝”，^①可见孔子读的《易》是以熟牛皮穿成的竹简书。用皮、韦绳串起来。还有用丝绳穿的：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引刘向《别录》：“孙子书以（已）杀青简，编以缥丝绳。”《南史·王僧虔传》：“楚王冢书青丝编。然则今人言编辑，固犹沿其旧称矣。”一卷竹简即一部书，称“卷”自此开始。“册”，本通作策，汉人通借策作册，《礼记·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册。”《周礼·内史》：“凡命诸侯及公卿大夫，则策命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昭公三年，郑伯如晋，晋侯嘉焉，授之以策。”是册即策之证明。至汉末则通行以策为册。蔡邕《独断》曰：“策者，简也。礼曰：不满百文，不书于策。其制：长者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篆书，起年月日。札，牒也，亦曰简。编，次简也，次简者，竹简长短相间排比之，以绳横联之，上下各一道。一简容字无多，故必比次编之，乃容多字。”据郑玄《礼记》注，上述乃汉法，非古制。《左传》杜预序疏引郑氏《论语》序，《钩命诀》云：“《易》、《诗》、《书》、《礼》、《乐》、《春秋》，策长二尺四寸；《孝经》谦半之，一尺二寸；《论语》，策八寸，尺二寸者三分居二，又谦焉，此古制也。”

近人王国维考证：战国时，竹简最长的二尺四寸，其次为一尺二寸，最短的八寸；两汉时，最长的二尺，其次为一尺五寸，最次为一尺，最短的五寸。每片一般写20或40多字，最少的也有写3至4字的，有分栏和不分栏之别。商代的简册未保存下来。

竹书最早发现在汉武帝末年，见《汉书·艺文志》。晋武帝时，从魏襄王墓中发现了16部竹简书。

稍后有木书。汉代王充在《论衡·量知篇》中说：“断木为槧，析之为版，力加刮削，

^① 司马迁著：《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

乃成奏牍。”一块木板，谓之版；版上写字谓之牍；一尺见方的牍，谓之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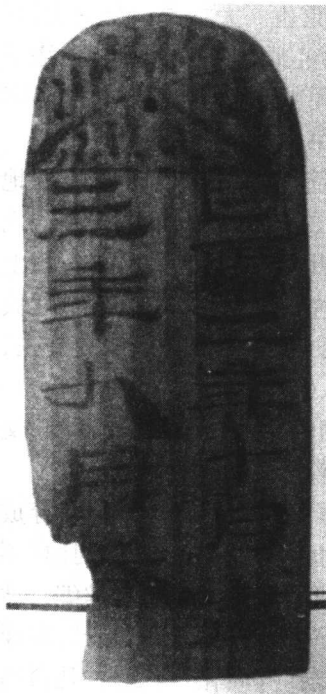


图 1-4 汉居延木简之一^②

档案文书写在木牍上，《礼记·聘礼》：“百名(字)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中庸》：“文武之道，布在方策。”一般来说，竹书容字少，木书容字多。^① 木书多为官府文书、名册、布告、通信、图画之类。1907年，英人斯坦因盗走的敦煌汉晋唐间木简，是边戍公文军册，可以证明。如东汉和帝永元五年至七年(93~95)的兵器簿，世所谓《永元兵器簿》者，由二道麻绳编联77根木简而成，是我国古代册形图书比较完好的实物。左面是居延汉简中发现的二枚木简(图1-4)八分书，两面有字，正面两行“远食过关出入簿”，反面两行“甘露二年十月尽，三年九月吞”。上端作半圆形，花头图案，有小孔，便于穿系，形如后世的腰牌而较小，大概是出入关门用以为符信者。“甘露”为汉宣帝年号，“二年”为公元前52年。图1-5上书写有“初元三年九月壬子朔辛巳令史克”字样，初元为汉元帝年号，三年当为公元前46年。汉制，边塞职官所居之地，大者曰城曰障，小者曰隧。障有尉有令史、尉史、障卒、施行等职官。此简薄如纸片，也是八分书。^②

古人写信，通常用一尺长的木版，谓之尺牍，故古代书信称“尺牍”。因为用木版做地图比竹简好，故常被用来绘地图，后世称国家的领土为“版图”，是其遗意。我国先秦各种材料的书籍中，还有玉册。

简牍容易出现断简，造成脱简、错简等情况，郭沫若整理《楚辞·天问》时就根据这些情况加以推测。

[4] 缣帛书籍，又称素书缣书

写在缣帛上的书籍称帛书，与竹书同时出现。帛是质地轻软的丝织品，较体积庞大、笨重的竹简方便得多。帛书约流行于春秋到魏晋时，并延至唐代。法国的伯希和于1908年从敦煌石室盗走的四卷黄绢卷轴上都写有佛教或道教的经典，其中一件上写有417年(晋安帝义熙年间)的尾题。帛书作为信证，简册写成档。《墨子·尚贤》说：“古者圣王，书之竹帛，传以遗后世子孙。”《晏子春秋》记齐景公谓晏子曰：“昔吾先

① 据武威《庆氏礼》汉简。

② “中央图书馆”特藏选录：《宝藏》书影四五，1986年7月。

君桓公子管仲孤与穀，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说明帛书至迟在春秋时期，已经与竹木简并用。至秦汉时期，缣帛书较为通行了。《汉书·东方朔传》：“著于竹帛。”王充《论衡·短书俗记》：“竹帛胤（俗本作胤）文，非儒者所见。”《三国·魏志·文帝纪》注引胡冲《吴历》曰：“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帛书价值昂贵，一般人在纸发明以后就不再使用帛书了，但在贵族中仍在使⽤。魏晋期间，简、帛依然并行。竹筒便于刮削修改，可作书之初稿，缣帛着墨深入腠理，难以修改，可以作为书的定本。^①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帛书实物是从战国楚墓及汉墓中发掘出来的。帛书的形制古代的为二尺二寸宽，汉代的沿袭古制，然更为考究。据文献记载，那时有专门为写书用的缣帛，上面织有或画有红色或黑色的界行，称之为“朱丝栏”、“乌丝栏”。

缣帛书可据文章长短随意剪裁，随意舒卷，且适宜于用来绘画、制图。《汉书·艺文志》记载群书，或以篇计，为竹书，或以卷记为缣帛。卷数不如篇之多，可知两汉缣帛制书不如竹筒制书多。社会上较普遍地使用帛书大约在战国到三国之间，此后就逐渐被纸替代了。

由于缣帛的贵重，卷末所余舍不得弃之不用，有时还另书他字，所以，缣帛书容易出现卷后所书与前面所书为另一部书的情况，稍一不慎，极易相混。

[5] 石版书籍

将文字刻写在石头上，旨在给人们阅读并流传后世，这种具“版本”意义的石版书，溯源很早。今见周代文献以金文和石刻为多。值得提的有下面几种：

1. 石鼓文

现存于北京故宫的最古而可信者是春秋秦国的十个石鼓，鼓上刻有十首叙述田猎活动的四言诗歌，与《诗经》中的大小雅相近，世称“石鼓文”，亦称“猎碣”。字体雄浑匀整，略呈方扁，较甲骨文和金文简单，笔道遒劲凝重，气韵淳古，朴茂自然，是入手大篆的极佳范本。学者考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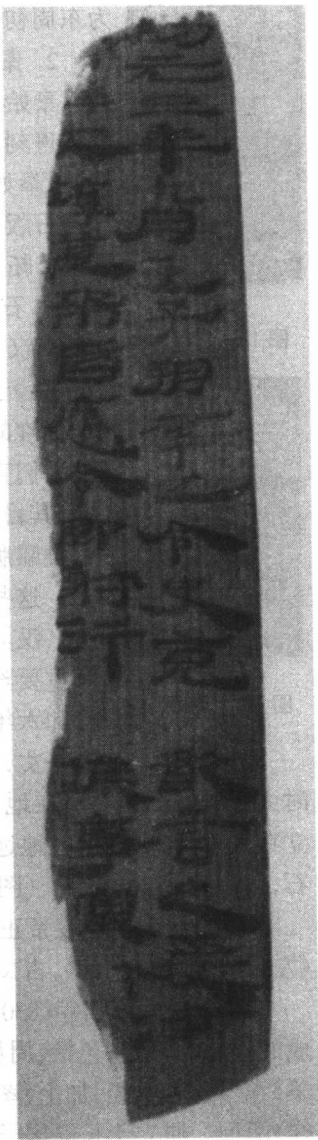


图 1-5 汉居延木简之二^①

^① 《宝藏》书影四六。



图 1-6 石鼓文

为东周初年打造。(图 1-6)

2. 秦刻石文

秦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七年,巡行各地时留下了七篇刻石文,诸如琅琊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罘罘刻石、峰山刻石(图 1-7)等,小篆体,拳如钗股直如筋,旨在宣扬秦始皇的文治武功,这些刻石文被称为石版书籍。秦刻石文也成为石经的先例。可以供人凭览,也可用来传拓,具有传播复录功能,石刻称得上是版印图书的先驱。

3. 石经

东汉平帝元始元年,王莽命甄丰摹古文《周易》、《尚书》、《诗经》、《左传》于石,开石经之先河。把常用的经书刻在石版上,作为一个最标准的本子,让学者们携带自己的手抄本来这儿校对,没有书本的人们直接到这儿抄写。石经的刻制,发挥了石刻最大的书籍功能,其目的及效果已经完全赋予了石刻经书以图书版本的意义。这类雕版印刷以前刻在石碑上供人们抄写或墨拓的经、子等石版书。这些石刻都是由政府建立的,校勘精审,著名的有以下几种:



图 1-7 秦峰山刻石文

汉灵帝熹平四年(175),皇帝令当时著名的学者蔡邕把七部儒家重要经典,用丹写在石碑上,使陈兴等刻工镌刻,从熹平四年到光和六年(183)刻成《七经》(五经和公羊、论语二传)四十六块。碑高一丈,广四尺,又宽又大,是丰碑形式。树立在洛阳鸿都门,即当时太学(国立大学)所在地,“使天下咸取则焉”,^①这便是有名的《熹平石经》。当时立在太学门外,全国各地远道来此抄写和校读的学者,填塞街陌。《熹平石经》今有残石,残存有 1900 多字。(图 1-8)

魏石经。曹魏废帝正始中刻的《正始三体石经》(古文、篆、隶)《尚书》、《春秋》、《左传》(至庄公中叶),古文出自孔宅壁中本,今存残石。

唐太宗太和四年(830)由艾居晦、陈王介等人用楷书分写,至开成二年(837)刻成的《开成石经》,包括《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和《穀梁》九经,加上《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附刻《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种。原立于长安国子监,今完整地保存在西安碑林。共 114 石,均高 217 厘米,宽 97 厘米,文刻两面,228 面,共 650252 字。(图 1-9)

还有唐玄宗时的《石台孝经》、五代孟蜀时的《广政石经》旧拓残本,《道德经》也有唐代的五种石刻。

以上石经出于无雕版之前,所据古文赖以传后,所以有很高的价值,为后世校订

① 范晔著:《后汉书·儒林传序》。